

互聯網思維與學術期刊變革的思考路向

王浩斌

從根本上說，學術期刊主要有兩種功能，這兩種功能也是學術期刊存在的意義所在，一是學術信息的社會傳播功能，二是學術評價功能。前者是最基本的功能，學術期刊最初以“通訊”為名，表明了學術期刊在其起源之初所蘊含的學術信息傳播功能。後者即學術期刊的學術評價功能是一個演化出來的功能，它是在學術信息傳播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正是由於學術信息（論文）通過學術期刊而廣泛傳播，在學者群體中產生影響，從而形成一種社會性的輿論，通俗地說，就是所謂的口碑。所謂的學術評價，追根溯源，它在根本上是指這種學者群體中的社會輿論。

作為一種社會輿論的學術評價，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很難進行精確的量化測量。然而，由於國家在科研方面投入了大量資金，由此產生了相應的管理與考核要求；對於管理部門來說，最好的管理考核辦法就是應用各種指標進行衡量，由此便可一目了然。因此，產生了對原先比較模糊的學界之社會輿論進行量化分析以採取相應管理辦法的客觀需求。與此相應，作為社會學研究中定量分析的方法——統計學——則為此提供了一個方法論的基礎。有客觀需求，有解決方法，二者的結合，極大地促進了量化學術評價方法的興起。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可以通過定量分析與統計的方法來對社會輿論（輿情分析）進行精確量化；而所謂的引文分析（CSSCI），只不過是挪用了社會學輿情分析的這種統計方法而已。無論是學者發表論文的數量，還是以論文引用率進行評價，從根本上說，都是適應管理部門量化管理與研究諮詢機構統計分析這二者結合與共謀的產物。

由於引文評價的方法論基礎是統計學，作為一種統計學的方法，它只能幫助我們瞭解過去和現在的狀況，無法把握未來。從思想發展的歷史來看，有許多偉大的作品由於思想過於超前，因而是在作者死後若干年其價值才被人們發現。因此，真正的定性的學術評價必然是歷史評價，所謂“千秋功罪，任後人評說”，而引文分析只能是基於統計學的定量分析，決不可能是定性評價。之所以說真正的學術評價是歷史評價，是因為只有從人類文明與歷史發展進步的角度出發，才能真正對前人的是非功過作評價，正如解釋學所認為的，所有的文本解釋都是“歷史解釋”一樣。這就是歷史性的體現。這一點體現在學術這個特殊的領域中便表現為：一個學者、一篇學術論文真正的學術貢獻，只有通過後來者把握當下學術發展（後來者的學術場域）與回逆歷史（學術史梳理）才能發現端倪。基於以上邏輯，我們認為，關於學術期刊之學術評價功能的討論是一個偽命題，學術評價的問題只能交給學術史，任何人都無法代勞。因此本文只討論學術期刊的社會傳播功能，並從這一點出發來思考學術期刊的變革之路。

從文化傳播的角度來看，人類的歷史可以分成口傳文化、印刷文化和電子文化三個階段。從生產方式角度來說，學術期刊是印刷文化的產物，最早的學術期刊是與印刷機的發明聯繫在一起的。印刷機的發明，使人類的知識成果擺脫了手抄本進行傳播的方式，可能進行大規模的複製，而工業革命之後的工廠模式則加速了這一進程。當商人們發現出版是一個有利可圖的事情之後，便加入了這一行業，促進了出版業的繁榮。總的來看，工業時代的機器（印刷機）+生產方式（工

廠模式) + 商人，構成了傳統期刊的產業鏈條。

隨著後工業文明與電子文化時代的來臨，特別是網絡和數字化的技術出現以後，基於工業文明的期刊產業鏈被打破。人們可以通過數字系統將媒體聚集在一起，即所謂“混搭”，並且對其進行再次包裝，以此來促進新型的協作表達方式。這種方式甚至使傳統的學術研究方式也發生變化：傳統的讀書做卡片的資料收集方法被數字化的信息搜索技術所取代。傳統學術研究方式的重點在於收集資料，乾嘉考據學是其典型；而在數字化時代，由於資料海量、文獻資源過多，使得資料並不缺乏，缺乏的是分析資料的眼光。在數字化時代，一個新的寫作方式、表達方式與傳播方式將出現。學術論文的寫作不再是學者單獨坐在書桌前的思考與奮筆疾書，思想不再是個人獨白式的沉思，而是合作、共享，信息與文化會以一種新的方式聯繫在一起，而且可以重複利用。比如，有些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已經出現了集體創作，網友可用接龍的方式創作完成一部文學作品；來自草根的網絡寫手的影響力正借助互聯網而超過傳統的知名文學作家。在學術界，由於還有一道學術與學歷門檻的存在，從而築起了一道防波堤，阻擋了草根學人進入學術的殿堂；此外，社會上還存在著學術崇拜與知識崇拜的心理，使得來自草根的網絡寫手還不能以自己的草根創作顛覆學術權威。不過，文學的聖殿已經被顛覆，學術的聖殿還能存在多久呢？

從信息與知識傳播的產權角度來看，在前數字（網絡）時代，人類發明了一整套法律規範，用以保護人們的知識創新，如版權、正當使用等。然而，進入數字化時代和網絡社會後，這些法律禁令將面臨著“自動失效”的可悲境遇。網絡社會以自己的方式嘲弄那些早已過時的法律禁令。所謂的版權，其本質是知識產權。在前現代社會，知識雖然被貴族所壟斷，但知識並不能成為一種財產權。版權是隨著出版產業的出現並成為一個贏利的營生而誕生。這種傳統的版權概念及其維權方法是建立在印刷術技術的基礎之上，它在數字化的時代面臨著嚴峻挑戰，人們認為從網上獲得和複製信息是一種自由的權利。所謂著作權，則是建立在一次性寫作的基礎之上，著作權法對著作權的定義是一個完成的作品。那麼問題是，如果通過“剪切、複製、黏貼”所產生的作品是不是著作呢？從學術角度來說，或許可以指責此類作品是抄襲，然而，從創作角度看，這類文本也是一種創新，是一種互文性的、超文本式的創新。所謂的“超文本”是建立在創造衍生作品的觀念基礎上，即某個人能夠將一篇文章中的部分內容剪切下來，放到另一部作品中，而數字技術則為人們借助他人的作品提供了條件。這種開放性的複製與創新，使得人類總體上會將自己的力量發揮到極致，這從現代學術論文的發表數量不斷地膨脹就可以看出來。現代社會的信息爆炸現象，與超文本以及文本複製的學術生產方式是分不開的。此外，文本複製還會給學術研究帶來一個問題，即我們永遠不知道文本的原來面貌，當我們在複製或者轉發文本時，我們並不知道最初的文本源於何處、它是否被人修改過。最為關鍵的問題是，文本的最初語境已不為我們所知。而對於文本研究來說，文本意義取決於語境，離開了特定的語境，文本的意義將不被我們所瞭解——通俗地說，離開了特定的語境，必定產生“斷章取義”式的理解。這對於我們理解和認識思想史與學術史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從期刊的生產流程來看，傳統的期刊製作分成編、印、發三個流程，在網絡社會與電子媒介的世界中，編輯變成文本的鏈接；印刷術已經死亡，它被鼠標輕輕一點的複製功能所取代；發行則被網絡上的下載功能所取代，傳統的各級書商成為網絡中的一個節點（服務器）。在網絡時代，真正的原創作品即信息的最初提供者與作品的原創者將很難再掙到錢。掙錢的人變成了信息的集散者——網絡平臺。這從今天的學術網絡平臺的運行模式可以看出來：提供信息的作者和學術期

刊沒有掙到錢，掙大錢的是知網平臺（CNKI）。而在傳統的版權體系保護下，傳統的作家可以掙錢，是因為大規模複製的技術十分複雜，它必然通過專業書商和印刷廠進行合作才能完成，因此，只要把書店和印刷廠管住，就可以管住版權的侵權問題。然而，在網絡社會中，大規模複印是一個十分簡單而監管又十分困難——因為在網絡世界中複製是匿名的，即使想打擊盜版，也不知它在哪。因此，原有的版權管理方式已不能適應網絡社會的要求。既然每個複製網絡文件的“盜版者”多如牛毛，無法監管，那麼政府其實是可以去監管網絡平臺。然而，許多網絡平臺（如谷歌）認為自己並不是那個“盜版者”，只是盜版信息的搜索工具，而谷歌的贏利模式是把“鏈接”提供給人們——它自己並不提供內容，因而就規避了版權法的監管。其他一些不是搜索引擎的網絡平臺，也大都是通過協議的方式，把相關的法律責任推給了期刊。

正如淘寶網把中國許多大型商場搞垮了一樣，以中國知網為代表的網絡平臺在掙到大錢的同時，把廣大的學術期刊也逼到了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境地。學術期刊最重要的生命力在於其傳播功能；然而，在大型的數據庫中，期刊與作者之間的聯繫早已被數據庫所切斷，讀者看到的只是數據庫中的單篇文章，而無法看到整個期刊的全貌，這會導致期刊與讀者失去聯繫——這一點是對學術刊物的致命打擊。過去由於學術期刊是在體制內生存，對於發行的好壞以及讀者評價並不關心，期刊關心的是上級領導的評價，這是體制化生存所造成的路徑依賴關係。由於體制決定了期刊不需要關注自己的讀者，由於不關注讀者需求，因此也就不關注發行。在網絡時代，期刊的發行主要是通過網絡傳播，因此，當網絡傳播剛剛興起之時，由於不關注期刊的發行已成為期刊的通病，因而自然而然地忽視了與發行密切相關的網絡傳播權問題。而以中國知網為代表的大型數據庫平臺的誕生，它們在獲得網絡傳播權的同時，也切斷了期刊與讀者之間的聯繫；它在集中了所有期刊的信息資源時，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信息的零散化和碎片化。當學術期刊的完整性被知網數據庫解體時、當期刊失去了自己的讀者時，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價值。當前學術期刊之所以能存在，是依靠學術期刊的衍生出來的、甚至是異化出來的功能——學術評價功能。為了應對這一挑戰，學術期刊應當重構一個新型的傳播整體，應當重建與讀者的直接聯繫，更進一步地說，是要重新奪回被知網壟斷的那些社會關係。在這方面，大型社交網絡 Facebook 的經驗值得期刊借鑒，因為它就是在一個陌生化的網絡世界之中建立起人與人間的關係。

在以上這種複雜的局面下，期刊應當怎麼辦？期刊人應當如何看待作者？應當如何理解我們的讀者？應當如何理解一個刊物存在的意義？這不僅是每一個期刊人要思考的問題，也是這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只不過，期刊人作為媒體從業人員，在網絡傳播的時代首當其衝。或許，這是歷史給予期刊人的一個機會，讓期刊人首先進行這方面的探索。在這裡，有兩個問題值得關注：一是這種思考要站在時代變革的高度，這一時代變革的廣度與深度可以與 17 世紀的工業革命相比，後者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因此，當我們思考這一問題時，需要有一種歷史感，這種歷史感可以幫助我們獲得一種方向感——儘管這種方向還十分朦朧，但可以指引我們前進。二是期刊的變革是這個互聯網時代變革的反映，作為一個時代的變革，決非易事，更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按照任何一個事先設想的藍圖、任何一個想畢其功於一役的做法，必定會以失敗告終。對於一個未知的事業，只能以探索的心態和不怕失敗的胸懷來對待。作為探索，失敗將是大概率事件，期刊人有幸生逢其時，即使明知面對失敗，充滿不確定性，也要有大無畏的精神與氣概。這或許是一個充滿著不確定性的互聯網時代最需要的一種精神氣質。

（作者係《南京大學學報》副主編、教授）